

吴夏平 著

唐代文馆文士 社会角色与文学

以唐代学官、史官、著作郎官、“三馆学士”等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角色考察文士群体共相、角色流动及其与唐代文学演进之关联。
主要解决经学教育与文学观念，作家迁转与区域文学，
谏诤意识与史传表达，角色互化与文体新变，访书活动与文学传播，
群体创作与诗体化育等较重要的文学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代文馆文士 社会角色与文学

吴夏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文馆文士社会角色与文学/吴夏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
(贵州师范大学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5161-0557-3

I. ①唐… II. ①吴… III. ①知识分子—社会地位—
研究—中国—唐代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①D691. 7 ②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6099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1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206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	(1)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1)
第二节 文士社会角色	(4)
第三节 群体共相与文学	(10)
第四节 角色流动与文学	(13)
 第一章 学官社会角色与文学	(19)
第一节 唐代官学与学官	(19)
第二节 学官社会角色变迁及其与文学之关系	(24)
第三节 唐代经学活动的制度性保障	(63)
第四节 从学官角色看韩愈贬潮与文学互动之关系	(73)
 第二章 史官社会角色与文学	(101)
第一节 史官社会角色规定性	(101)
第二节 史官谏诤意识及其文学表达	(107)
第三节 史官与实录纂修	(125)
第四节 史官与行状撰制	(133)

第三章 秘书省郎官社会角色与文学	(143)
第一节 秘书省郎官	(143)
第二节 秘书省社会地位变迁	(146)
第三节 著作郎官的学术活动及其文学影响	(156)
 第四章 校书、正字社会角色与文学	(171)
第一节 校书、正字社会角色	(171)
第二节 校书、正字与文学	(178)
第三节 访书活动的文学史意义	(191)
 第五章 学士社会角色与文学	(205)
第一节 “三馆”学士	(205)
第二节 学士文学角色及选任要求	(216)
第三节 学士社会角色与特殊诗体的形成	(222)
第四节 盛唐集贤学士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239)
 主要参考文献及征引书目	(249)
 后记	(261)

引 论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文馆”到底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者的表述不尽相同。正史所记，无一统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有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两《唐书》有“三馆”一词，如《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天书云“三馆生徒，即令追集”^①，及《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武官后”^②，但此“三馆”当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个学馆，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文馆的学者是日本池田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馆之盛，中古所未见，而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唐朝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秘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而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及州、县学。其外更有馆院之设，可谓备矣。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

^① 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67页。

^②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5页。

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① 照池田温氏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大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徒、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入文馆范围。

李德辉认为文馆似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两汉以降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学’为名，在掌理图书的秘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馆’，主掌图籍的校理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它虽然属非常设性文化机构，但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大，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等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② 这样就将文馆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选择密切相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必要相同。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从宏观通照的角度出发，将“中央文馆”界定为：（1）指唐代中央文馆，与地方文化机构有别；（2）指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的馆所。因而选定包括国子监、史馆、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馆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对象。^③ 正是缘于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其所关注对象也不一样。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比较重视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该书第一章讨论唐初文馆与初唐诗风，指出：“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继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

① [日] 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192 页。

② 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③ 拙著《唐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研究》，齐鲁书社 2007 年版，第 4—5 页。

这就是开国初太宗朝文馆学士集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团、武后朝的珠英学士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①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②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氏著选取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集贤学士、翰林学士。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③也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取。

从文馆研究的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历史学视野，关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和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考辨。二是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文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三是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可归结为文馆学士与作家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学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与诗体发育等方面。已有成果无疑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他们往往致力于某一中央文化机构的研究，“点”多“面”少，缺少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又因囿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较多，因而在“与文学”之关系的讨论方面，亦尚有较为广阔的空间。

重新思考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主要还有赖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和理论，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究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是比较有价值 and 意义的。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传统研究多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文馆的价值，但其落脚点并非文学。吸收前人成果，推进

① 罗时进：《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② 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齐鲁书社2005年版。

③ 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并深化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史意义。其二，以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借鉴社会学理论，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和文学社会学层面有所突破，还原文馆文人与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系统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也是对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其三，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学者热衷于从空间分布、科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析文士的精神风貌，对于文士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之联系则关注不够。因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迁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精神风尚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第二节 文士社会角色

相同的事情，必依相同的秩序，发生于相同的条件之下；此秩序与条件即是所谓常轨。一物有一物所以别于他物者；一类之物又有其共同之点，为其类之所以别于他物者。此一类所共有之性质，即是所谓共相。^① 提炼事物之共相，并加以分类，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法则之一。有唐一代之文馆文士，亦可依此法则进行探究。这是因为某种文馆之文人必有区别于其他文馆的共性。换言之，各文馆本身皆具相对独立之表征，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有所不同，社会角色变迁的轨迹亦各自相异。要认识这个问题，须从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工入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正式确立是在官师分离之

^① 冯友兰：《人生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后。周朝后期的几百年，王室丧失权力，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丧失了职位，流落各地。这时候他们就转而以私人身份教授他们的专门知识。^①正是由于官师分离，分工不明确的状态被打破，各门各派逐渐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工愈细，角色愈明，官师分离之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才真正确立起来。

司马谈和刘歆曾对先秦时期各学派加以分类并追根溯源。《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②

司马谈所论六家之优劣，可以看作对他们职业角色的总结。而六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甚大，且各有师承。刘歆在六家的基础上扩展为十家，并溯其渊源：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8—3289页。

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① 刘歆所谓某家出于某官的说法，并不十分确切，但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学者对先秦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发展衍变的探索和认同。

六家或十家对后世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和道家。后世知识分子综合此两家之精髓，形成独特的精神品格，如果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孟子之语，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对知识分子生存技巧的启示和道义角色的规定。然而，得志不得志，并不完全是个人所能控制的，所以孔子承认“天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孔子之“知命”，其实正隐含着知识分子的悲剧精神。因为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可是“明知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却在客观世界促成悲剧的产生。从另一角度来看，得志与否，还在客观上促成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转换。因此，承认天命，也就是承认社会角色变迁的客观事实。如何面对变迁，则正是角色意识形成的心理机制。

根据社会学角色理论，社会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规定性表现角色和开放性表现角色。前者的权利和义务均有较明确的规定，承担者不得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后者的行为规范没

① 参看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4年版。

有明确严格的限制，承担者有较多自由发挥的余地。^① 基于此种理论，文馆文士的规定性角色是指文士所任官职及其承担的职责。比如学官职司教育，秘书省官员负责图籍的庋藏和整理，史官纂修史书等。开放性角色则指社会所赋予的某种荣誉角色，比如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思想家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并非截然分开，往往同时集为一体。比如韩愈在规定性角色方面既担任过国子博士、史馆修撰等职，同时在开放性角色方面又是学者和诗人。这种现象，学界称之为角色叠加或“角色集”，在唐代知识界是较为普遍的。此外，以下两点与文士社会角色内涵密切相关，应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区分兼职与专职，有必要弄清楚官与职的区别。对于官与职的区分，傅璇琮有较为明确的论断：

官与职的区别，我们还可以举白居易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来作佐证。白居易友人李建，于贞元末、元和初曾为翰林学士，他于穆宗长庆元年（821）卒，白居易特为其作一碑文：《有唐善人碑》（《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一）。碑中概述李建的仕历，把官、职、阶、勋、爵分得很清楚：公官历校书郎、左拾遗、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员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礼部刑部侍郎、工部尚书；职历容州招讨判官、翰林学士、郾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吏部选事；阶中大夫；勋上柱国；爵陇西县开国男。这是当

① 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时人叙当时事，应当说是可信的。由此可见，如校书郎、左拾遗等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等是职。而凡翰林学士，都须带有官衔。……这是因为，翰林学士本身是一种职务，他必须带有其他正式的官职名称，这样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而同时，不管所带的是什么官衔，他仍在内廷供职，承担翰林学士的职能，并不去做所带官衔的职务。^①

此段论述，将官与职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讲得很清楚，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文馆文士角色的认识。国子监和秘书省两个机构的官员，均为职事官。史官和“三馆”学士均属临时差遣性质。史官的差遣性质，诚如张荣芳所指出的：“无论担任史馆史官的情况如何转变，他们都有其本职事官，平时必须处理日常公务，另拨时间来兼负撰述史书的工作。也就是在其工作之上，增加额外的工作分量，因此，每当修撰国史或实录完成献上时，天子为了体恤、酬佣他们的辛劳与成就，往往颁赐爵赏等以为旌勉。”^②三馆学士也都有其本职事官，学士属于临时差遣性质，有时作为荣誉授予有功之臣，多数时间则是为了完成某种特殊工作，当工作完成之后，官员所充任的学士头衔也随之罢去。开元十三年贺知章以礼部侍郎充任集贤学士，宰相源乾曜语（张）说曰：“贺公两命之荣，足为光宠，然学士、侍郎孰为美？”说曰：“侍郎衣冠之选，然要为具员吏；学士怀

① 傅璇琮：《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② 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励委员会1984年版，第152页。

先王之道，经纬之文，然后处之。此其为间也。”^① 张说的意思是，侍郎为职事官，系俸禄和品位之所寄，学士则是对怀道之人的认同和奖赏，非杰出文士不可。这些观点同样也能加深我们对官与职的进一步认识。

其二，文士社会角色是动态的开放系统，主要表现为角色的社会变迁。规定性角色在一段时期内是较为稳定的，但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则又是变动不居的。比如弘文馆学士，在唐初担任着多重职责，“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② 但在中宗神龙以后，其职责固化为详正图籍和教授生徒，而作为皇廷智囊参政议政的角色逐渐萎缩废弃。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盛唐集贤院和翰林院的兴起剥脱了部分职能。再比如著作郎官，其工作性质也发生了从修史到职司碑志的转移。《旧唐书》卷四十三“史馆”：“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皆著作郎掌修国史。武德因隋旧制。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③ 被罢去史职后的著作郎主要工作是“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也”。^④ 文士的开放性角色也同样发生着变迁。比如国子监学官，在唐初还主要是以经学家和经师的身份从事教育。中唐以后之学官，像韩愈、吴武陵、欧阳詹、温庭筠等人，已经从经学家转变为文学家。他们与唐初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①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贺知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06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48页。

③ 同上书，第1852页。

④ 同上书，第1855页。

文士社会角色与文学之关联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从静态方面来看，群体共相影响文学活动；从动态方面来看，社会流动和角色转换对文学传播、文学形态嬗变、文学潮流波动等均产生作用。

第三节 群体共相与文学

偏于静态的文士群体共相与文学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诗文中表现出强烈浓厚的角色意识；二是不同文馆均有其相对稳定性，群体文学活动各有特色；三是职务的重要与否影响文学心态。

其一，文馆文士社会角色意识强烈，主要表现在自我体认和对他者的认同上。唐代诗人都有较为强烈的角色体认和认同意识。以卢纶诗歌为例，卢氏曾以诗评友，诗题详细地罗列出他们的官职：《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沔、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三十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沉下泉。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以申悲旧，兼寄夏侯侍御（一作郎）审、侯仓曹钊》。^①于此可见唐人角色意识程度之深。文馆文士的诗文作品，同样也体现出这种角色意识。刘禹锡任职集贤学士时，作有《裴相公大学士见示答张秘书谢马诗并群公属和因命追作》^②，裴相公指裴度，曾任集贤殿大学士；张秘书指张籍，曾任秘书郎。吉中孚任校书郎职满归乡，李嘉祐、卢

①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5页。

② 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447页。

纶、李端、司空曙等相聚送行，诗题均作“吉校书”^①。诗歌中更揭示出其所曾任职，如司空曙诗云：“少年芸阁吏，罢直暂归休。”卢纶诗云：“青袍芸阁郎，谈笑挹侯王。”芸阁即秘书省，“芸阁吏”和“芸阁郎”意谓吉中孚任职秘书省校书郎，“罢直”指任职期满。从题目到内容，文士诗作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角色体认意识。

其二，不同社会角色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存在差别，而且对文化和文学传承革新的使命感，以及由此造就的文学思潮和思想氛围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国子监的主要职责是教授生徒，但教育总是与科举考试相联系的，在“诗赋取士”风气影响之下，学官不仅要传授经术，而且还要教导诗歌创作。史官的主要职责是修撰前代史和当朝实录。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对社会发展易持批判态度。如唐传奇作者模仿史传的叙事技巧，在小说的结尾处往往又有一段模拟史传论赞的议论，即受其影响的。秘书省相对闲散，为文士提供了许多活动空间，如元白在秘省校书期间的诗歌创作，都深深地烙上了任职特色的印记。校书、正字作为文士起家之良选，亦为年轻人提供学习机会。此外，秘书省图书的采集，为文人空间流动提供了诸多可能。而庞大的学士群体，对于新诗体的发育贡献甚大，他们共同推进近体诗律体律调的定型，并使之走向成熟。

其三，职务的重要与否影响创作心态。比如唐初秘书省，因其权非要剧而饱受诟病。《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七“秘书

① 参看《全唐诗》卷二百六十李嘉祐《晚秋送吉校书归楚州》、卷二百六十七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卷二百八十四李端《冬夜与故友聚送吉校书》、卷二百九十二司空曙《送吉校书东归》，分见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51、3124、3235、3322页。

省”条引《两京记》：“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署。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佐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①所谓病坊者，实为鄙薄之辞。其职闲散而无实权，故为世俗所不喜。这种情形也直接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如卢象开元中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有诗《赠程秘书》：“客自岐阳来，吐音若鸣凤。孤飞畏不偶，独立谁见用？……顾余久寂寞，一岁麒麟阁。且共歌太平，勿嗟名宦薄。”^②天宝时期綦毋潜曾官校书郎，但不久即弃官东归。王维《送綦毋潜校书弃官还江东》云：“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念君拂衣去，四海将安穷。”^③都是失意落寞的表征。但这种情况到中唐发生改变，秘书省校书、正字成为趋进之目标。杜佑说：“（秘书省校书郎）掌讎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④文士的心态与此变化密切相关。白居易在离任十年后再次经过秘书省时，不禁感叹道：“阁前下马思裴回，第二房门手自开，昔为白面书郎去，今作苍须赞善来。吏人不识多新补，松竹相亲是旧栽。应有题墙名姓在，试将衫袖拂尘埃。”^⑤元稹所作和诗也一同回忆当年情形：“经排蠹简怜初

①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七，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05页。

②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17页。

③ 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2页。

④ 杜佑：《通典》卷二十六《职官八》“秘书校书郎”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5页。

⑤ 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1页。